

略论景教在蒙古族历史中的传播、兴衰与当代影响

罗晓平 神父

引言

北方蒙古草原是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交融的核心枢纽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、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，让这片土地成为外来宗教传播、扎根、流变的重要场域。在蒙古族漫长的信仰发展历程中，本土原生的萨满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，藏传佛教、伊斯兰教、道教等宗教先后传入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而景教是最早系统性传入蒙古诸部、深度参与蒙古贵族政治体系、短暂形成规模化传播态势的外来基督教分支。

景教不同于后世传入中国的天主教、新教，其适配东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双重特质，使其得以在唐代突破地域壁垒传入中原，又在中原禁教危机中转向北方草原存续，最终在蒙古民族崛起的历史浪潮中迎来鼎盛。从 11 世纪蒙古草原部族零星信仰，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贵族普及，再到蒙元王朝举国建制化发展，景教一度成为与萨满教、佛教并行的重要宗教，深刻影响了蒙古皇室婚姻体系、政治制度、社会习俗与对外交流模式。

然而相较于持续传承、深度融入蒙古民族文化的萨满教与藏传佛教，景教在蒙古族的存续呈现出“骤盛骤衰”的鲜明特征。元末政权更迭、宗教生态重构、外部文明冲击、自身传播局限等多重因素叠加，让盛极一时的蒙古景教迅速消亡，未形成常态化的民族信仰传承。时至今日，景教虽已不再是蒙古族的主流信仰，但其留存的文物遗存、文化符号、历史记忆，仍镌刻在蒙古族文明发展脉络中，成为欧亚草原文明交融的重要见证。

基于此，本文遵循“起源溯源—传播历程—鼎盛发展—消亡探因—当代遗存”的逻辑脉络，全方位梳理景教在蒙古族历史中的产生、发展、衰落全过程，厘清景教与蒙古族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的互动关系，弥补草原小众宗教流变研究的细节空白。

一、景教的本源、起源与整体东传历程

（一）景教的核心定义与教义特质

景教，正式名称为聂斯脱里派基督教，是公元 5 世纪诞生于西亚的基督教东方分支，“景教”为其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称谓，取“光明、远大、大道”之意，契合东方文化语义，寓意“光明普照之教”。其起源源于基督教早期的教义分歧与教会分裂，核心创始人是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里。

公元 431 年，基督教以弗所大公会议判定聂斯脱里教义为“异端”，核心争议围绕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、圣母称谓展开。聂斯脱里主张“基督二性二位论”，认为耶稣兼具完整的神性与人性，神性来自天主，人性来自凡人母亲，二者相互依存但互不混淆，因此反对将圣母玛利亚称为“天主之母”，仅认可其为“耶稣肉身之母”。这一教义与当时罗马教会推崇的“基督两性一位论”形成根本分歧，最终导致聂斯脱里被革除教职、流放异域，其追随者被迫脱离拜占庭教会，向东迁徙避难，逐步形成独立的聂斯脱里派教会。

相较于西方正统基督教，景教具备极强的东方适配性，这也是其能够跨越中亚荒漠、传入中国草原与中原的核心优势。其一，教义简约包容，摒弃了西方教会繁琐的仪式与严苛的教规，简化洗礼、礼拜、斋戒等核心仪式，适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、居无定所的生活模式；其二，文化包容性强，不强制排斥本土民俗信仰，允许信徒保留部分传统祭祀、祈福习俗，降低了跨文化传播的阻力；其三，组织灵活，无严格的层级固化体系，传教士多依托商贸路线、部族联盟开展传播，机动性强、适配性广。

正是这种兼容、灵活、务实的特质，让景教避开了西方宗教的排他性桎梏，成为古代欧亚大陆传播范围最广、存续时间最长的基督教东方分支。

（二）景教的西亚起源与中亚扩散

公元 5 世纪中叶，聂斯脱里及其信徒流亡波斯萨珊王朝，得到波斯王室的包容与庇护，正式扎根西亚地区，建立独立的教会体系与教区制度，总部设于波斯泰西封。此后数百年间，景教在波斯境内快速发展，摆脱“异端”标签，成为萨珊王朝认可的合法宗教，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神职体系、传教制度与信众群体。

公元 6—7 世纪，景教开启大规模东扩进程，沿着中亚绿洲城邦、草原商贸路线逐步渗透。先后传入阿富汗、粟特、突厥斯坦等中亚地区，依托粟特商人、突厥部族的流动轨迹快速扩散。粟特人作为古代中亚最核心的商贸族群，常年穿

梭于欧亚大陆，成为景教东传的核心媒介，将景教教义、经文、仪式带入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。

至公元 7 世纪初，景教已在中亚突厥诸部中形成规模化传播，部分突厥部族全民皈依景教，为后续传入蒙古草原、扎根蒙古诸部奠定了重要的族群与地域基础。

（三）景教传入中原与唐末草原转型

景教正式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始于唐代贞观九年（635 年），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携经卷、教义抵达长安，朝见唐太宗。唐太宗秉持开明的宗教政策，认可景教传播，下诏准许其在长安建寺传教，初称“波斯经教”。

唐建中二年（781 年），景教信徒立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于长安，详细记载景教入唐百年的传播历程、教义体系与皇室优待政策，成为景教在中原传播的核心实物佐证。在唐代开明包容的宗教环境下，景教快速发展，鼎盛时期在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成都等数十座城市建有景教寺院，信众涵盖官员、百姓、胡人商旅等多个群体，成为与佛教、道教、摩尼教并行的主流外来宗教。

唐会昌五年（845 年），唐武宗推行大规模灭佛运动，实行“废佛、禁外来诸教”政策，景教、摩尼教、祆教等外来宗教均被取缔，寺院被毁、经卷遭焚、传教士被驱逐，中原景教彻底绝迹。

此次禁教事件成为景教传播的重要转折点，中原传播路径彻底中断，大量景教传教士、信徒被迫逃离中原，向北迁徙至河西走廊、漠北草原、西域地区避难。依托北方草原相对宽松的宗教环境，景教得以延续香火，开启扎根北方草原、面向游牧民族传播的新阶段，为后续进入蒙古诸部、在蒙元鼎盛发展埋下伏笔。

二、成吉思汗时代景教在蒙古草原的初步传播

（一）蒙古草原景教传播的前期基础

唐末以后，中原景教消亡，但北方草原的景教传播从未中断。历经五代、辽、宋、金数百年发展，景教在漠北、漠南草原持续渗透，依托草原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、部族联姻、人口迁徙，逐步在蒙古草原西部、南部部族扎根，形成稳定的信众群体与传教据点。

辽金时期，景教已成为蒙古草原部分核心部族的主流信仰，其中克烈部、汪古部、乃蛮部是最早、最核心的景教信仰部族，这三大部族也是成吉思汗统一蒙

古草原过程中最重要的盟友与对手，为景教进入蒙古核心统治圈层提供了关键载体。

克烈部是漠北草原最强的游牧部族之一，游牧范围涵盖今蒙古国中部、内蒙古北部草原，早在 11 世纪初便全员皈依景教，是蒙古草原最早的景教部族。史料记载，克烈部首领王汗（脱斡邻勒）是虔诚的景教信徒，部族内部建有固定的祈祷场所，保留景教洗礼、十字祈福等核心仪式。

汪古部游牧于漠南阴山南北、河套地区，地处中原与漠北草原的交通枢纽，商贸发达、文明交融频繁，是景教传播的核心枢纽部族。汪古部世代信奉景教，贵族阶层普遍笃信教义，家族传承景教信仰，留存大量景教墓葬、十字纹饰文物。

乃蛮部盘踞阿尔泰山南北，毗邻中亚景教核心传播区，受中亚景教文化深度辐射，12 世纪已形成规模化景教信仰群体，部族贵族多为景教信徒，留存的叙利亚文景教铭文可佐证其信仰普及程度。

这三大部族的景教信仰积淀，让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草原具备了成熟的景教传播土壤，无需从零构建信仰体系，为景教快速融入蒙古核心圈层提供了核心基础。

（二）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与景教的圈层渗透

12 世纪末，蒙古草原部族林立、战乱纷争，铁木真（成吉思汗）开启统一蒙古草原的征程。在统一战争中，成吉思汗采取“兼容并蓄、因俗而治”的宗教政策，不排斥任何合法宗教，尊重各部族固有信仰，以此收拢各部族民心、巩固统一大业，为景教的存续与传播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。

在军事联盟与部族兼并过程中，景教信仰部族尽数纳入蒙古统一体系，景教随之进入蒙古核心统治圈层，实现从“边缘部族信仰”向“蒙古整体信仰”的突破。

其一，部族联盟带来信仰融合。成吉思汗早年与克烈部王汗结为安答（兄弟），长期依附克烈部发展，深度接触景教文化。克烈部作为景教核心部族，其贵族的信仰习俗、宗教仪式深刻影响了早期蒙古贵族圈层。即便后期蒙古与克烈部决裂，兼并了克烈部，景教信仰依然在蒙古贵族中保留延续。

其二，贵族联姻推动信仰普及。蒙古皇室长期与景教部族贵族联姻，形成固定的通婚体系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迎娶克烈部、汪古部景教贵族女子为妻，其

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（克烈部贵族、虔诚景教徒）。她是蒙哥、忽必烈、旭烈兀、阿里不哥四位大汗的生母，被称为“四帝之母”，其个人的景教信仰深刻影响了窝阔台、蒙哥两代汗廷的宗教氛围，让景教在蒙古皇室拥有极高的地位。

其三，兼并战争扩大传播范围。成吉思汗统一乃蛮、克烈、汪古等景教部族后，将各部民众纳入蒙古万户、千户体系，人口的整合让景教信仰从局部草原扩散至整个蒙古草原，普通蒙古牧民开始接触、接纳景教教义与仪式。

在成吉思汗时代，景教并未取代萨满教的主流地位，但已正式进入蒙古统治核心圈层，成为蒙古贵族阶层的重要信仰，完成了在蒙古族群体中扎根、立足的关键阶段，为窝阔台、贵由、蒙哥时期的鼎盛发展奠定了政治与民众基础。

（三）成吉思汗时代景教的传播特征

这一阶段的景教传播呈现三大鲜明特征。第一，圈层集中化，信仰群体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、汪古、克烈、乃蛮等西部部族，普通蒙古核心部族信众较少，尚未实现全民普及。第二，依附政治化，景教传播完全依托蒙古部族政治联盟、皇室联姻体系，无独立的传教体系，兴衰与蒙古贵族政治深度绑定。第三，文化兼容化，蒙古信徒并未摒弃本土萨满教，形成“萨满教为主、景教为辅”的双重信仰模式，既保留萨满祭天、祈福、驱邪传统，又践行景教十字祈祷、斋戒仪式，宗教融合特征显著。

三、蒙元鼎盛时期景教在蒙古族的全面发展

成吉思汗之后，窝阔台、贵由、蒙哥相继执掌蒙古汗廷，至忽必烈建立元朝、统一全国，近百年间景教迎来在蒙古族历史中的鼎盛黄金期。从贵族专属信仰发展为全国性合法宗教，从草原局部传播拓展至全国范围，形成建制化、规模化、体系化的发展格局，成为蒙元王朝最具影响力的外来宗教之一。

（一）蒙古汗廷的宗教优待政策

窝阔台、蒙哥等历代大汗延续成吉思汗包容开放的宗教政策，且进一步提升景教的政治地位，给予景教信徒、神职人员极高的特权。相较于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，景教因深度绑定皇室贵族，成为蒙元前期最受尊崇的宗教。

贵由汗本人亲近景教，汗廷中大量景教神职人员担任顾问、祭祀官职，参与皇室礼仪与政治决策。蒙哥汗时期，景教影响力达到顶峰，汗廷核心礼仪多融入

景教元素，皇室祭祀、重大庆典均会举行景教祈祷仪式，景教被视为“国教级”尊崇宗教。

元朝建立后，忽必烈延续优待政策，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年），朝廷专门设立崇福司，作为全国唯一管理景教（元朝称也里可温教）事务的官方机构，品级高、职权广，专门掌管全国景教寺院、神职人员、宗教活动、信徒户籍，实现了景教的官方建制化管理。

同时，元朝赋予景教徒诸多特权：景教神职人员免除赋税、徭役、兵役，寺院拥有专属土地、财产、人口，不受地方官府管辖；普通景教信徒可减免部分赋税，极大吸引了蒙古牧民、色目人、汉人的皈依，信众规模快速扩张。

（二）元代蒙古族景教的全域传播格局

蒙元时期，景教彻底突破草原局限，形成草原核心、全国扩散、全民渗透的传播格局，信众覆盖蒙古贵族、军队、普通牧民、官僚阶层。

在蒙古本土草原，漠南汪古部、漠北克烈部故地成为景教核心教区，寺院林立、信徒云集，是景教的根本根据地。内蒙古阴山、河套、赤峰、通辽等草原区域，留存大量元代景教十字寺遗址、墓葬石刻、十字纹饰器物，印证当时信仰的普及程度。

在中原内地，随着蒙古军队南下、元朝统一全国，景教跟随蒙古贵族、色目官吏、驻军传入中原、江南、西南地区。大都（北京）、上都（开平）、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泉州、杭州等城市均建有大型景教十字寺，其中大都成为全国景教的中心教区，聚集大量叙利亚、中亚、西域传教士。

从信众结构来看，蒙古族是核心主体。皇室宗亲、王公贵族大多信奉景教或尊崇景教，蒙古军队中大量士兵皈依景教，普通蒙古牧民的信众占比持续提升。同时，色目商旅、西域移民、部分汉人也成为景教信徒，形成以蒙古族为核心、多民族共存的信仰群体。

（三）景教对蒙古族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入

鼎盛时期的景教，不再是单纯的外来宗教，而是深度融入蒙古族政治、礼仪、文化、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产生了全方位的社会影响。

在政治层面，景教成为蒙元皇室巩固统治的文化工具。大汗通过尊崇景教、优待信徒，团结草原西部部族、笼络西域色目群体，维系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稳定；

景教神职人员作为皇室亲信，参与外交、祭祀、教化事务，成为朝廷特殊的政治群体。

在礼仪习俗层面，景教仪式深度融入蒙古贵族生活。皇室婚丧嫁娶、登基大典、出征祭祀、节日庆典，均会举行景教十字祈祷、祈福仪式；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十字纹饰、叙利亚文景教经文石刻，景教符号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。同时，部分景教节日、斋戒习俗被蒙古民众接纳，与传统草原节日融合共存。

在对外交流层面，景教成为蒙古帝国联通欧亚的文化纽带。蒙古景教教会与西亚叙利亚景教总部、欧洲教会保持长期往来，传教士、信众穿梭于欧亚大陆，推动了元代中西文化、宗教、商贸交流，让蒙古草原成为欧亚基督教文明传播的重要节点。

在文化融合层面，景教实现了深度本土化。摒弃了西方繁琐的教义体系，适配蒙古游牧生活，简化宗教仪式；兼容萨满教祭天、敬畏自然的理念，形成兼具基督教内核、草原文化特质的本土化信仰形态，完全适配蒙古族的生存与文化环境。

四、景教在蒙古族中消亡的核心成因

元末明初，盛极一时的蒙古景教快速衰落、彻底消亡，至明代中后期，蒙古族群体中已无规模化景教信仰，景教彻底退出蒙古主流宗教体系。其消亡并非单一因素导致，而是政权更迭、宗教竞争、外部冲击、自身缺陷、地缘格局变化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。

（一）元朝覆灭与政治依托彻底崩塌

景教在蒙古族的传播，自始至终高度依附蒙元皇室政权，是典型的“政治依附型宗教”，缺乏独立的民间生存根基与传承体系，这是其快速消亡的根本原因。

明代洪武元年（1368 年），元朝覆灭、元顺帝北逃，蒙元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彻底终结。明朝建立后，推行排斥外来宗教、恢复本土正统的宗教政策，严厉取缔元代盛行的也里可温教、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，拆毁景教十字寺、驱逐西域传教士、禁止民间景教信仰，中原地区的景教体系彻底瓦解。

北逃的北元政权实力大幅衰退，失去对中原、西域的掌控，丧失了优待景教的政治能力与经济基础。原本依附皇室供养、官府庇护的景教寺院、神职人员失

去依托，无官方经费支撑、无政治特权保障，大规模寺院荒废、神职人员四散流亡，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彻底崩溃。

不同于萨满教扎根民间、融入民族血脉，也不同于藏传佛教拥有底层民众根基，景教的核心信众集中于蒙古贵族阶层，随着北元贵族势力衰落、政权碎片化，景教失去了核心传播主体，直接走向崩塌。

（二）藏传佛教的强势崛起与信仰替代

宗教内部的激烈竞争，是景教消亡的核心内部因素。蒙元时期，藏传佛教萨迦派、格鲁派持续向蒙古草原渗透，相较于景教，藏传佛教更适配蒙古族的文化特质、更贴合民众精神需求，最终全面取代景教的信仰地位。

其一，文化适配性更强。藏传佛教源于青藏高原游牧文明，与蒙古草原游牧文明同根同源，其轮回转世、善恶因果、敬畏自然、众生平等的教义，与蒙古萨满教的世界观、价值观高度契合，极易被普通牧民接纳。而景教作为西亚外来宗教，教义内核、文化逻辑仍与东方草原文明存在隔阂，仅能依靠政治优势传播，难以深度扎根民间。

其二，传播体系更完善。藏传佛教拥有成熟的寺院教育、僧侣传承、活佛转世体系，能够实现代际稳定传承；而景教依赖外来传教士传播，本土神职人员稀缺、无系统教育体系，一旦外部传教通道中断，便无法自主延续。

其三，政治绑定持续深化。北元时期，蒙古大汗主动推崇藏传佛教，以宗教统一凝聚草原各部、重塑统治权威。阿勒坦汗等蒙古首领大力扶持格鲁派，广建藏传佛教寺院、册封活佛、推广佛法，让藏传佛教快速覆盖蒙古草原全境，成为蒙古族唯一的主流正统信仰。

在藏传佛教的强势挤压下，景教的生存空间被彻底压缩，原有信众逐步改信佛教，残存的景教仪式、习俗被佛教文化同化，最终彻底消失。

（三）中亚伊斯兰化浪潮的外部阻断

中世纪后期，中亚、西亚地区掀起全面伊斯兰化浪潮，彻底切断了景教东传的外部源头，这是景教消亡的关键外部因素。

原本景教的核心根据地在西亚、中亚，蒙古草原景教的传教士、经卷、教义更新均依赖中亚通道供给。14 世纪以后，帖木儿帝国崛起，在中亚、西亚强力

推行伊斯兰教，取缔景教、摩尼教等外来宗教，中亚传统景教教区尽数覆灭，景教在西亚、中亚的千年传播体系彻底崩溃。

自此，景教东传的外部源头彻底断绝，蒙古草原残存的景教群体失去了教义补给、神职人员输送、教会联动的所有渠道，成为孤立无援的“孤岛信仰”。没有外部新鲜血液补充，本土又无完善传承体系，残存的景教信仰只能逐步自然消亡。

（四）景教自身的传播缺陷与文化局限

景教自身的先天不足，是其无法长期扎根蒙古族、实现永续传承的内在核心原因，也是其相较于佛教、萨满教的根本短板。

第一，信仰排他性与依附性矛盾突出。景教高度依赖贵族政治，只注重上层圈层传播，长期忽视底层牧民的信仰培育，民间根基极其薄弱。鼎盛时期虽信众规模庞大，但多为政治优待、政策红利吸引的被动皈依，缺乏发自内心的信仰认同，一旦政策消失、政权崩塌，信众即刻流失。

第二，本土化程度不彻底。景教虽简化仪式、兼容民俗，但核心教义、神学体系、宗教符号依然是西亚原生体系，未真正融入蒙古族的民族文化、民俗传统、精神内核，无法形成民族化的信仰体系，难以实现代际传承。

第三，传承体系脆弱。景教无本土化僧侣培养机制、无固定的民间传教模式、无全民普及的信仰传统，完全依赖外来传教士与贵族阶层维系，传承链条单一、抗风险能力极差，遭遇政治、外部危机便彻底断裂。

第四，信仰受众狭窄。景教始终未能突破贵族圈层局限，普通牧民的信仰忠诚度极低，无法形成全民性的信仰共识，不具备长期存续的民众基础。

（五）蒙古本土萨满教的文化兜底留存

萨满教作为蒙古族原生宗教，历经千年传承，深度融入蒙古族的生产生活、民俗礼仪、精神信仰、民族记忆，是蒙古族文化的核心根基。景教作为外来宗教，即便在鼎盛时期，也从未取代萨满教的民间主流地位。

元末以后，外来宗教优待政策取消，蒙古草原回归本土文化本位，萨满教的传统祭祀、祭天、祈福、驱邪习俗重新占据民间信仰主导，进一步挤压了景教的残存生存空间。景教零散的信仰习俗逐步被萨满教、佛教同化、消解，最终彻底融入本土宗教体系，不复独立存在。

五、景教在蒙古族中的当代遗存与现存影响

历经明清数百年的宗教重构与文化整合，当代蒙古族群体中已无规模化、制度化的景教信仰与传承体系，景教不再作为独立宗教存在。但千年的传播历史，让景教在蒙古族文化、草原文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留存大量实物遗存、文化符号、历史记忆，依然发挥着微弱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影响。

（一）现存实物文物遗存

内蒙古草原作为景教在蒙元时期的核心传播区，留存大量珍贵的景教文物遗存，是景教与蒙古族交融的直接实物见证。

目前内蒙古全区已发现数百处元代景教遗存，核心集中在包头、鄂尔多斯、呼和浩特、赤峰、通辽等原汪古部、克烈部游牧区域。主要遗存包括：景教十字寺遗址、贵族景教墓葬群、十字纹饰石刻、叙利亚文景教墓碑、景教青铜饰品、壁画残片等。

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阴山汪古部景教遗址群，是国内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蒙元景教遗存，出土大量刻有十字图案、叙利亚文经文的墓碑与石刻，清晰记载了元代蒙古族贵族的景教信仰生活、神职体系、传教活动，为研究蒙古景教历史提供了核心实物依据。

这些文物遗存已成为北方草原宗教交融史、中西文明交流史的重要文化遗产，被纳入地方文物保护体系，是景教留存至今最核心、最直观的历史价值。

（二）民俗文化 with 符号遗存

景教在数百年传播中，部分宗教符号、民俗仪式潜移默化融入蒙古族民间文化，形成隐性的文化留存。

其一，十字符号的文化残留。十字作为景教核心符号，在元代蒙古贵族器物、服饰、墓葬中广泛使用，部分草原地区的蒙古族传统纹饰中，依然保留简化的十字元素，与传统云纹、兽纹融合共存，成为文明交融的隐性印记。

其二，仪式民俗的间接融合。部分蒙古族祈福、祭祀、洁净的民间仪式，依稀保留景教洗礼、斋戒、祈祷的简化痕迹，与萨满教、佛教仪式融合，形成复合型民俗形态，难以单独剥离，但可追溯景教文化源头。

其三，地名与历史记忆留存。部分内蒙古草原古地名、遗址名，保留元代景教寺院、教区的历史印记，成为景教传播历史的口头与文字记忆载体。

（三）学术与文化研究的持续影响

当代语境下，景教对蒙古族的核心影响集中在历史文化与学术研究领域。景教在蒙古草原的千年传播历程，是欧亚基督教东传史、北方草原宗教流变史、蒙元中外交流史的核心研究课题。

学界通过对蒙古景教遗址、文物、文献的考证，厘清了古代东西方宗教传播、游牧文明与西亚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，弥补了中世纪中西交流史的细节空白。景教与蒙古族的互动历史，充分证明了北方草原是古代世界文明交融的核心枢纽，展现了蒙古族开放包容、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特质。

同时，景教的兴衰历程，也为研究外来宗教本土化、跨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典型样本，对当代宗教文化交流、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（四）当代信仰层面的无存续现状

从宗教信仰层面而言，当代蒙古族完全无景教传承。目前蒙古族的主流信仰为藏传佛教与传统萨满教，民间无景教教会、无神职人员、无信徒群体、无宗教活动，景教教义、仪式、传承体系已彻底消亡，不再具备宗教属性，仅留存历史文化价值，无现实信仰影响力。

近现代传入中国的天主教、新教，与古代蒙古景教无直接传承关系，属于完全独立的宗教传播体系，二者不存在信仰传承的延续性。

六、结语

景教在蒙古族历史中的千年浮沉，是一部完整的外来宗教跨文明传播、融合、鼎盛、消亡的发展史，也是古代欧亚草原文明交融的生动缩影。从唐代中原扎根、唐末草原存续，到成吉思汗时代贵族渗透、蒙元全域鼎盛，再到元末彻底衰落、当代仅存文化遗存，景教与蒙古族的互动历程，呈现出鲜明的“政治依附、骤盛骤衰、融而不存”的核心特征。

景教能够在蒙古草原鼎盛发展，得益于其适配游牧文明的教义特质、蒙元皇室的政治扶持、草原开放的宗教环境、部族联姻的传播载体；而其最终彻底消亡，根源在于过度依附政权、民间根基薄弱，叠加藏传佛教的信仰替代、中亚伊斯兰化的外部阻断、自身传承体系的先天缺陷。

相较于深度融入蒙古族民族血脉、永续传承的萨满教与藏传佛教，景教终究是蒙古族历史中的“阶段性外来宗教”，未能实现彻底的民族化扎根与永续传

承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景教在蒙元百年鼎盛期间，深刻影响了蒙古政治格局、社会礼仪、文化形态与对外交流，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互动，为蒙古族文化注入了多元的外来基因。

时至今日，景教虽已退出信仰舞台，但其留存的文物遗存、历史记忆、文明交融经验，依然是蒙古族历史文化、北方草原文明、中西交流史的宝贵财富，为后世研究跨文明传播、宗教本土化、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。回望景教在蒙古族的兴衰历程，也更能印证：唯有扎根民间、适配本土文化、融入民族精神内核的信仰与文化，才能实现长久存续、代代传承。

2026. 8. 31 于榆林转龙湾天主堂